

简述国家图书馆三件新入藏西夏文献的装帧特征

□ 谢谨诚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西夏立国于1038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立,1227年亡于蒙古,享国190年。西夏文是在西夏立国前夕由野利仁荣创制,文字使用长达五六百年,期间写印了大量文献。但因元代史官未给西夏立专史,仅附传于宋、辽、金三史中,遂使西夏文史料大量散佚,造成传世文献的阙略。其后随着20世纪初期考古学兴盛,大量西夏文献出土,学界逐渐开始了对西夏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关注与研究,西夏学随之兴起。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对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与收集,现为我国西夏文献的最大藏家,世界三大藏家之一。2015年前,馆藏西夏文献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1917年宁夏灵武县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大部分于1929年入藏至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二是苏联政府于1958年捐赠的黑水城出土文献。国家图书馆深知此批馆藏的珍贵,对其保护与整理工作从未停止。2003年,国家图书馆启动西夏文献修复项目,历时一年,共计修复馆藏西夏文献120余册件,8000余面^①。修复过程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修复档案,根据档案记载,当时修复的多为西夏文经折装佛经。

2015年,国家图书馆又入藏了一批西夏文献。版本、装帧复杂多样,内容涵盖政治、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等专家学者判断,均为历史原件,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但这批文献入藏时由于破损严重,且病害情况复杂,暂无法供研究利用。国家图书馆经一年筹备,于2017年立项,再次启动西夏文献修复项目,对2015年入藏的约130册件西夏文献开展抢救性修复,修复工作已于2022年大致完成,验收及数字化等收尾工作现正有序推进。

此次修复专项,系国家图书馆对馆藏西夏文献的第二次系统性修复,因所修文献病害情况复杂,装帧形式多样,加之尚未经系统编目整理,修复工作难度较大,部分修复方案仍在论证调整。虽然抢救性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待解决的问题尚多,对文献装帧形式的判断及归类尚未正式启动。本文从修复时的见闻、记录出发,对其中三件与“缝缀装”装帧近似的文献略作描述,仅供学界专家及业界同仁参考。

一、缝缀装的主要特征

由于缝缀装存世实物甚少、历史记载简略,学界尚无明确定义或界定方式。同时由于缝缀装出现时期,书籍的写印及装帧方式处于演变发展期,装帧样式多变,因此专题研究难度

^①杜伟生、林世田:《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的修复及其汉文文献残片的价值》,苏荣誉,詹长法,[日]岗岩太郎编:《东亚纸质文物保护——第一届东亚纸张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0-109页。

较大。可参考的存世实物中，装帧完好的样本亦多有不同，即便对同一册件文献或残叶，学界观点也尚有未统一之处。

方广锬先生曾在《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一文中描述“缝缀装”一词由来，上世纪90年代初，方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整理馆藏敦煌遗书时发现此种装帧，彼时尚无名称。后经时任图书修整组（现文献修复组）组长杜伟生先生考证，《四库备要》本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一书中曾引王洙所述书籍装帧方法，涉及“缝绩”一词。由此根据古代记载将之定名为“缝绩装”。随后多位专家在相关著作及论文中均引用此名称。但台湾温台祥先生在2014年11月的一次讲座中指出，以“缝绩装”命名装帧实为不妥，因张邦基所引王洙之言有误，原文应作“缝缀”而非“缝绩”，其后方先生所著文章，一律改为“缝缀装”^①。本文遵从方先生观点，以“缝缀装”展开论述，但所引前人文章仍延旧说。

牛达生先生在《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绩装》一文中，认为缝缀装主要特征有五点：第一，只有写本，没有印本；第二，先装订，后书写；第三，前后文字，多不相接；第四，页数成双，多为八页；第五，分迭缝缀，连迭成册^②。本文所述文献，均为写本，且部分书叶分迭。但因未经编目，文字顺序及装订与书写先后顺序有待考证。

史金波先生在《西夏风俗》中论述，缝缀装应是单张纸左右对折再上下对折，将若干折叠好的单页在中缝线订成叠^③。彭向前先生在《俄藏ИHB.No.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中赞同此说，并记述亲自目验俄藏文献装帧的经过，提供了实物佐证^④，为缝缀装的一种折页方式及缝线方式提供了依据，但存世缝缀装西夏文献实物中，也有与此说略有出入的装帧特点。

高辉女史在《瓜州东千佛洞泥寿桃洞出土一件西夏文献装帧考》中，对瓜州县博物馆所藏一件《金刚经》残叶加以考证，判断其为缝缀装的主要依据为折页方式及残留订线痕迹。梁松涛教授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明堂灸经〉残叶考》一文中的考证依据，主要为残叶的水渍印痕位置、残叶断裂形状，折痕位置及文字顺序等特征，据此判断该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西夏文残叶为缝绩装^⑤。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缝缀装公认的特点应为写本，单面书写，并多为先装帧后书写，故此一旦散落，极难恢复原有顺序。折叠时将单叶纸张单次或双次对折，书叶成一沓，缝线时多选在折缝位置。

以此为依据粗略判断，2015年入藏国图的西夏文献中，有三册残本装帧特点近似缝缀装，但部分特征略有不同。因此批文献尚未编目整理，故此内容、题名、编号暂缺。入藏时这批文献中的纸本大致分为18包，因此本文根据其所处包号，结合修复中见闻、图文记录简要描述装帧特点。

^①方广锬：《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文献》2018年第1期，第14-22页。

^②牛达生：《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绩装》，《文献》2000年第2期，第84-107页。

^③史金波：《西夏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60-465页。

^④彭向前：《俄藏ИHB.No.8085西夏历日目验记》，《西夏学》2013年第10期，第66-69页。

^⑤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明堂灸经〉残叶考》，《文献》第2017年第3期，第16-19页。

二、装帧特点

（一）第15包中的残本

第15包中的一件写本残本，纸张为皮纸，题名、内容待考，尺寸约为8.9×20.3厘米。修复前书口、地脚残损较重，天头、书脊稍轻，因水浸等原因，书叶已中度板结，无书衣残留。所幸书脊位置尚为完好，书线大部分残留，还可观察其缝线方式。走线方式为三眼订线，自书叶中缝处往复穿线，揭开书叶后也可看到内侧缝线位置。



图1 修复前的残本（封面）



图2 修复前的残本书脊



图3 修复前的残本书叶

此残本装帧形式极为特殊，根据“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原应将其装帧完整保留以供进一步研究，即在不拆解装帧的前提下完成修复操作。但在制定操作方案时发现，此册书线虽看似完好，但原打结、弯折处多已磨损，部分几近断裂，加之书脊位置缺损、板结，致使书线松动，已失去连接书叶效用，原样保留恐不利于文献保存及使用。

因此修复时拆掉原线，但拆线时尽量保持原线完整，并随书保存，作为实物档案。修复时先将书叶顺序编号，并以图文结合方式逐叶记录顺序、折叶方向等，以便修复后最大程度复原其装帧。



图4 修复中的书叶

因修复过程中拍摄的书叶照片稍显杂乱，为便于说明，此处使用修复后图片对此残本结构加以说明。

此册文献书叶左右单次对折后叠放，共分为六沓，尺寸大致相同。每沓书叶数目不等，且均为单面书写。第一沓1叶半，修复时补为2叶；第二沓5叶；第三沓8叶；第四沓4叶；第五沓2叶；第六沓仅剩半叶，修复后将其补整为1叶，因有字一面位于封底，为保护书叶，另加1叶补纸作为书衣。



图5 修复后的六沓书叶

书叶对折后一正一反顺次叠放，折口处集齐。因缝线位置在书叶正中，折叠缝线后无压字现象，或可据此推断为先装订后书写。每沓书叶数目相差较大，书线虽较为完好，但整册残损较为严重，且有半叶出现，无法排除部分书叶脱落的可能。书叶具体顺序及是否有漏页、错页，尚待释读文字后，再做进一步论证。

此册表面另粘连有散叶14叶，展平后尺寸约为20.4×12.9厘米。散叶修复前每叶也为左右对折，折后尺寸与残本相近。

因纸张与残本纸张颇为相似，修复前推测应为一册，系流转中保存不当，造成书叶断裂



图6 每沓书叶叠放方式（以第二沓为例）

所产生的散叶。但将其逐一编号、展平后，发现散叶文字为整叶书写，折叶中缝处无明显留白，部分折口位置处于文字正中。

此外如将残本字迹与散叶字迹对比，残本所书文字更为工整。散叶中部分书叶，如第5叶等为双面有字，一面为汉字，一面为西夏文。据宁夏大学硕士宋润文考证，双面书写的单折缝缀装在西夏出土文献中极少，多为敦煌遗书中留存^①。

综合字迹不同，折缝位置不同，加之未见明显穿线痕迹等特征，推测散叶与残本应非同册。但具体关系为何，仍有赖编目整理工作对文字内容的释读。

^①宋润文：《西夏缝缀装文献专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夏大学，2020年5月，第43页。



图7 修复后的部分散叶



图8 修复前的散叶（右）及残本（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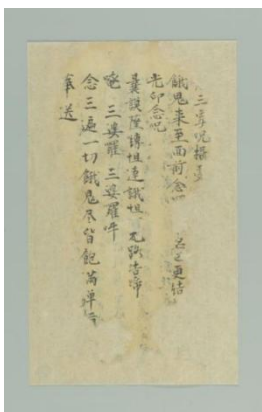


图9 修复后的第5叶散叶（汉文）



图10 修复后的第5叶散叶（西夏文）

为尽可能保留此残本缝线特征，在修复前仿照原有装帧形式及缝线方式，仿制出一册以实物记录缝线方式，结合拍照与文字记录，力求修复后复原其缝线形式。但此残本书叶叠放顺序复杂，致使结构繁复，各沓叶数不等，缝线后无法说明装帧形式。修复人员经研究讨论，并征询项目学术顾问^①建议后，拟先开展数字化及视频留档工作，待断明散叶与残本确无关系，再将其按原有形式缝缀，本文成文时相关工作未全部完成，因此修复后尚未缝缀。



图11 修复前仿制的样书



图12 修复后外观及原书线

^①因本馆无西夏文字专家，项目聘请史金波先生等相关领域专家作为学术顾问。

（二）第16包中的残本

第16包文献中的一册残本也具有缝缀装特征。该册题名、内容待考，尺寸约为16.3×19.2厘米，皮纸写本，修复前板结严重。从书脊位置观察，原书线结构仍完整，但因水浸、污损等原因，书线已变硬发脆，且磨损严重，打结处脱丝尤其严重。

此册缝缀方式与第15包中残本不同，从修复前状态观察，应为书页折叠、叠放、向右集齐后，在书脑位置穿五个孔洞作为线眼。缝缀时未从书页折缝中穿至书页里侧，此点与前述文献所载缝缀装特征颇有不同。为加以验证，拆线前将板结较轻的几页揭开观察，书页里侧未见书线，可确认缝线时均为外侧穿绕。

因书脊处已有中度磨损，加之纸张脆化，书线可整体取下。书线因磨损等病害已无原有



图13 修复前的残本



图14 书线



图15 修复前的书页



图16 拆解后的书页

连接、加固效用，因此修复时将书页逐叶拆解修复。

拆线后将书页逐叶揭开，并按序编号，用软毛刷清理泥沙等附着物。污损严重并遮挡字迹处，用40℃温水反复淋洗并吸去污水，直至字迹可辨认。书页折缝处虽有磨损、断裂，但仍可判明折叶方向及叠放顺序，按序一并记录。

将书页逐叶修补、加固、压平后裁齐边缘，并按原样折回。此处为便于说明，也以修复后的书页图片介绍结构。

此册书页共计12叶，均为单面书写。前后4叶，即第1、2叶及第11、12叶均为正折，即无字一面相向折叠，左右对折后单叶放置形成前后四沓。第1叶仅半叶书写文字，空白半叶似做书衣封面使用。有文字的半页，即首页粘贴有一纸条，尺寸约为5.9×18.4厘米。中间8叶，即第3—10叶为前后两叶无字面相向，即相邻两叶“背靠背”放置后左右对折，展开后书页为一正一反折叠放置。

12叶书页共折成八沓，前后各两沓为单叶，中间四沓为双叶，图19为结构示意图，左上角为单叶，前后四沓均为这种折叠方式，中间四沓为双叶叠放对折。折口位置向右集齐后，

在书脑位置缝线。但考虑修复前书线松动已近脱落，加之文字尚未释读，前后四沓单叶书叶间是否有缺页漏页也未可知。

将折口处集齐后，前后各加1叶皮纸，对折后作为书衣。取原打孔位置作为线眼，书线选与原书线相似材质棉线，直径参考原线及线眼直径。走线方式参考修复前图文记录，但因打结处污损板结较为严重，无法准确判断打结方式，且修复前书线多处已松散脱丝，所用走线方式或许与修复前稍有偏差。

此册折叠方式，尤其是中间四沓的折叠方式与缝缀装颇为类似，但缝线方式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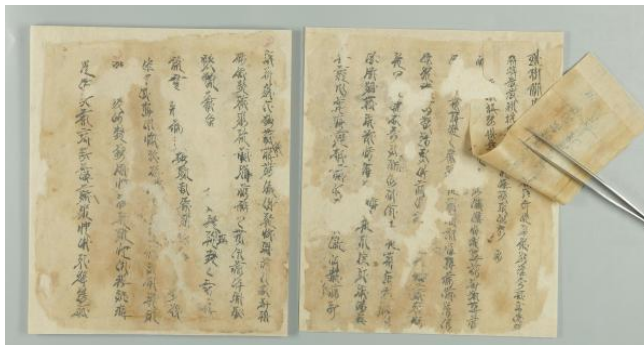


图 17 修复后的第 1、2 叶书叶



图 18 中间四沓书叶折叠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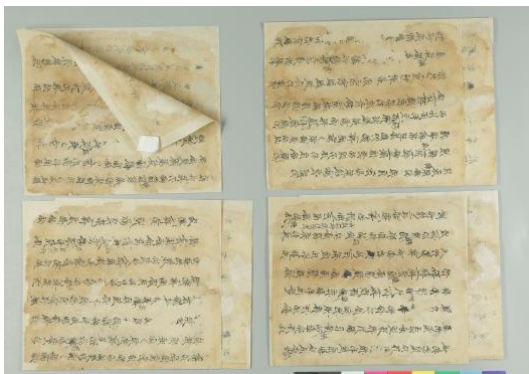


图 19 各沓书叶折叠方式示意



图 20 修复后的残本整体外观

刘郝霞研究员曾以敦煌遗书、西夏文献存世实物为例证，结合学界主流观点列举缝缀装折页、缝线特征。文中经多方比较后指出，缝缀装为古书装帧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过程装”^①。如借此论据妄断，此册或许为缝缀装向包背装、蝴蝶装等装帧形式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衍化形式，故此缝线方式有所不同，如可经释读文字进一步判断成书年代，或深入研讨。

（三）第 12 包中的小册子

第 12 包中另有一册小册子，折页方式与缝缀装颇多相似之处，但未见缝线，尚无法准确归类，本文暂将之与前述两册残本共同描述。

此件也为皮纸写本，尺寸约为 10.9×14.5 厘米，书叶由 3 叶纸折叠成 7 页，折页方式各有不同，在折缝位置以粘合剂粘接。书衣尚存，纸张略厚于书叶，为一整张纸，包裹于书脊处并与书芯粘接。修复前虽边缘有所磨损，所幸现有书叶均未脱落，且折页方式完好保留。

^①刘郝霞：《论“缝缀（续）装”——以中古写本文献为中心的考察》，《宏德学刊》，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十三辑，第 137-1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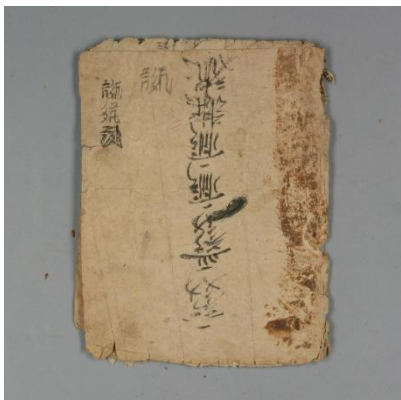


图 21 修复前的残本外观（封面）



图 22 修复前的书叶

书叶粘接处浆糊未完全失效，部分书叶虽有松动但未脱落。天头处书衣边缘略小于书叶，所幸未造成书叶严重磨损。为完好保留其装帧以供后续研究，修复时未拆解书叶。自破损边缘处依次补破，并喷水压平，裁齐四周边缘。

此处仍以修复后图片说明结构。最内侧4页为一叶纸，先上下对折再左右对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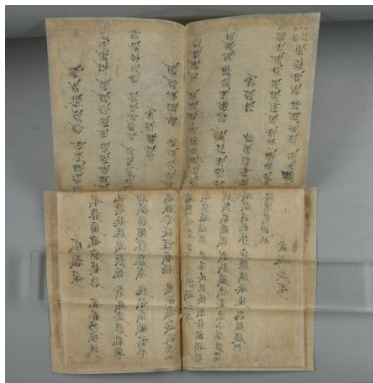


图 23 展开的内侧书叶



图 24 折叠后的内侧书叶



图 25 各叶折叠方式



图 26 最外侧半页

与此4页粘接的外侧2页也为一叶纸，尺寸为内4页纸张一半，与书衣尺寸大致相等，左右对折一次，形成2页，对折时文字相向。最外一页，纸张仅有书衣的四分之一，仅为前页一半，书写数个文字。

书叶内外均未见书线残留，也未见穿线孔洞，各叶间及书衣连接方式均为粘接，松动处在修补时已加固。修补书衣的书脊位置破损时，将补纸自外侧嵌入缺损处，修复操作均未对

其结构产生破坏。

此册封面、封底均写有文字，且封面两行文字方向不同。将书叶正放时，两面书衣的中心文字皆为倒置，但书衣左上位置三字却为正向。结合此批文献补纸、加固纸也多有写印文字这一特征，推测或为彼时纸张匮乏，装帧或修复时将故纸重复利用。

就折叶方式而言，此册书叶，尤其是内侧书叶的折叶方式与本文所引文献中描述的多件缝缀装实物相同，应可归类于缝缀装。但因外观保留尚为完好，却未见书线残留，并且连接方式为粘接，加之页数较少，故此其装帧归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或许为粘叶装变种之一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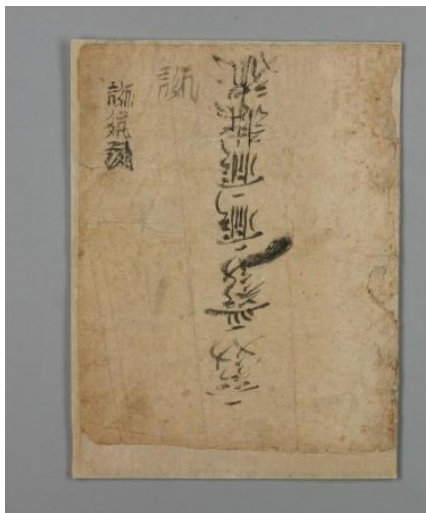


图 27 修复后的书衣（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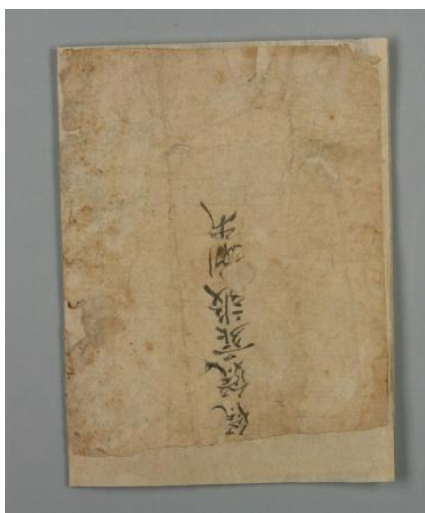


图 28 修复后的书衣（封底）



图 29 修复后的书衣（书脊）

三、结语

本文所论 2015 年国家图书馆入藏的三件西夏文古文献均为写本，第 15 包中残本的折页及叠放方式、中缝穿线等特征与学界对缝缀装的主流观点最为相符，应可归类为缝缀装；第 16 包中残本为书叶一正一反“背对背”叠放后左右对折，与部分存世缝缀装实物相同，但缝线位置为书背外侧，推测或为缝缀装的一种衍化形式；第 12 包中小册子的各叶折叠方式相差较大且页数较少，特点最不明显，但内页折叠方式与缝缀装颇多类似，因未见缝线，是否属于缝缀装还需再做比较论证。

因笔者水平有限，见识浅薄，本文仅尝试描述修复过程中所见装帧特点，权作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恳请方家雅正。